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年9月14-15日)

1、《国家利益》：韩美人工智能合作

9月8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登了佐治亚理工学院萨姆·纳恩国际事务学院国际事务、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生韩尚贤 (Sanghyun Han)的评论文章《韩美人工智能合作需要真正的互惠》。文章指出，韩国和美国都认识到对于双方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合作至关重要。通过以两国私营企业的竞争以及电动汽车制造商消费者补贴的《通胀削减法案》为案例，文章分析了韩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不平衡、依赖关系，以及传统的互惠原则在实践中的困境。为促进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协同效应，超越传统合作的局限性，增强双边关系和全球影响力，文章基于两国互补不足的需求，提出了一种基于扩散互惠原则的新框架，强调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而不是等价交换。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korea-watch/rok-us-ai-cooperation-needs-real-reciprocity-206775>

编译：刘嘉雯

2、兰德公司：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社交媒体操纵

9 月，美国兰德公司发布该机构帕迪兰德研究生院（Pardee RAND Graduate School）教授威廉·马尔凯利诺（William Marcellino）等学者的合著报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与社交媒体操纵 3.0 时代的到来》。报告指出，大型语言模型如 Open AI 的 GPT-3 和文本生成图像模型如 Stable Diffusion 可被用以生成逼真但虚假的信息与图像。服务于政治意图的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广泛传播可能将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威胁。各行为体均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高质量欺骗性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影响公众认知、偏好与共识，为服务自身利益控制、引导舆情，塑造公众对国内政治议程的共同理解，进而实现对包括干预总统选举在内的政治影响。作者对比了社交媒体操纵时代的发展演变：社交媒体操纵 1.0 时代通过批量低智能的虚假账户进行连续、自动的纯文本输出，但缺乏有意义的交互能力，很容易被识别检测；2.0 时代则更为复杂，通过机器抓取互联网信息，进行更自然的日夜循环发布，但与人类社交媒体用户的互动能力有限；在即将到来的社交媒体操纵 3.0 时代，人工智能将使虚假信息质量与可信度大幅提升，模糊可检测真实内容与合成内容之间的边界，通过合成的逼真视频、音频、图片进行深度造假和传播。此外，大语言模型将使机器人更人性化，提供了机器人自主决策的可能性，并使其像人类一样与用户互动。这增加了官方识别检测难度，对比此前时代解决诸多限制并降低部署成本。最后，作者建议美政府及技术、政策界积极应对人

工智能操纵社交媒体带来的潜在威胁，制定一项连贯、广泛、先发制人的战略以防范风险。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perspectives/PEA2600/PEA2679-1/RAND_PEA2679-1.pdf

编译：赵金钰

3、《外交政策》：美应学习中国的迭代式人工智能监管立法思路

9月12日，《外交政策》杂志发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马特·希恩（Matt Sheehan）所撰评论文章《美国可以从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中学到什么》。文章认为，过于宽泛的立法范围导致美国人工智能监管立法进展缓慢，而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立法经验可为美带来借鉴。首先，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立法采取了针对性方式。中国并没有直接进行全面立法，而是选取“推荐算法”作为切入点，在积攒人工智能领域专业知识的同时，逐渐将立法扩展到用户权利、数据标注工作者权利、图像合成等方面，最终形成系统的人工智能监管立法体系。其次，中国人工智能监管立法采取了迭代性方式。在 ChatGPT 的面世对现有人工智能监管规则带来巨大冲击后，中国立刻在原有监管规则的基础上颁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暂行办法，从而一方面保障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在中国的合规发展，另一方面为人工智能监管法规的进一步迭代留下立法余地。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9/12/ai-artificial-intelligence-regulation-law-china-us-schumer-congress/>

编译：高隆绪

4、Politico：美国参议院在 AI 治理方面开始出现分歧

9月8日，美国《政客》杂志网站刊登该机构研究员莫哈尔·查特吉（Mohar Chatterjee）和记者布伦丹·博德隆（Brendan Bordelon）的文章《参议院在 AI 治理方面开始出现分歧》。文章指出，一些参议员敦促参议院迅速采取行动以应对 AI 的快速发展，但也有议员认为国会需要更多信息才能采取行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于9月13日召集闭门会议，与科技公司探讨人工智能的风险与监管。此前一天，司法委员会上的知名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和乔希·霍利（Josh Hawley）举行独立听证会，以完善他们的综合 AI 规则。其他参议员也在针对深度伪造、政府采购自动化系统等问题起草与 AI 技术相关的零散立法。布卢门撒尔和霍利上周提出的 AI 框架可能是本届国会提出最具体的提案之一。该提案将为在“高风险情况”中使用的 AI 模型建立新的联邦许可和责任制度，以及提出关于透明度和儿童安全的新要求。舒默表示，他正在考虑以逐个委员会的方式进行 AI 监管，最终使参议院朝着更全面的计划迈进。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3/09/13/schumer-senate-ai-p>

olicy-00115794

编译：石佳怡

5、布鲁金斯学会：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市场高度集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潜在风险

9月7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登教授安东·科里内克（Anton Korinek）和学者杰·维普拉（Jai Vipra）共同撰写的论文《基础模型的市场集中度影响：ChatGPT的“看不见的手”》。该文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工智能基础模型的市场集中度及其风险进行分析，并给出监管建议。文章首先分析了人工智能基础模型的市场结构，指出前沿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具有强烈的自然垄断倾向，且由于该技术的通用性，随着技术进步，其潜在市场将遍布整个经济，因此其行业市场集中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前所未有。其次，文章研究了相关企业的战略行为及市场集中度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包括垄断扭曲、同质化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不平等加剧、监管捕获在内的负面影响分别进行分析。文章还对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与市场集中及市场竞争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探讨。为应对潜在风险，文章建议监管部门双管齐下：一方面，反垄断机构应采取措施确保市场竞争性，特别关注上下游生产商的垂直整合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市场的自我调节潜力因竞争不充分而受限，监管机构需确保基础模型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标准需要涵盖安全、隐私、非歧视、可靠性和互操作性等方面，以类似

于公共事业的监管方式保障消费者权益和社会福祉。最后，反垄断机构应与包括商务部门、数据保护机构等在内的其他机构密切合作，避免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market-concentration-implications-of-foundation-models-the-invisible-hand-of-chatgpt/>

编译：李一磊

6、《金融时报》：人工智能规则制定的全球竞赛

9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金融时报》记者理查德·沃特斯（Richard Waters）的文章《人工智能规则制定的全球竞赛》。文章提出，当前人工智能行业专家与相关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技术需要政府与有关机构的监管。2023年5月，由数百位包括 OpenAI、谷歌 DeepMind、Anthropic 和微软等公司首席执行官与科学家在内的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物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称减轻人工智能带来的生存风险应该成为全球优先事项。该事件进一步引发各国与区域组织着手制定人工智能监管法规。目前，欧盟、美国、英国、中国等国动向频繁。欧盟方面已出台《人工智能法案》，预计将在2023年底获得完全批准。英国则围绕11月将举办的首次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展开本国人工智能政策，包括增加技术投资等。美国立法者正在准备对人工智能进行广泛审查，确定需要针对哪些技术元素设置监管，以及现有法律可以涵盖哪些内容。目前为止，美国政府

已与亚马逊、Meta 等公司签署了一系列自愿承诺，承诺包括在人工智能系统向公众发布之前对其进行内部和外部测试，提升技术透明度。中国针对包括推荐算法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出台了针对性法规，并准备在未来几年起草更广泛的国家人工智能法。

<https://www.ft.com/content/59b9ef36-771f-4f91-89d1-ef89f4a2ec4e>

编译：和怡然

7、《外交事务》：美国大学不应切断与中国的所有联系

9月13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雷欧·拉斐尔·莱夫（Leo Rafael Reif）的文章《美国大学不应切断与中国的所有联系》。文章指出，2021年美国和中国科学家联合撰写的研究论文数量出现十年来首次下降，离开美国前往中国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人数也在上升，对打算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美国的留学吸引力正在下降。当前，美国政府继续对与中国的学术合作持谨慎态度。文章论述了美中之间的学术合作不应受到限制的六个原因。第一，在美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学术交流可以帮助人们超越国家叙事，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找到共同点，可以为改善双边关系，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第二，美国大学吸引世界最优秀人才的能力是美国成功的关键，这也恰好是风险最小的全球参与形式。

教育国际人才，对美国大有裨益。第三，全面限制与中国同行的合作将意味着限制美国的进步。第四，不同类型的合作涉及不同程度的风险，因此应进行相应的评估，特别是一些特定领域，如气候变化、大流行病预防、癌症治疗和食品安全，这些领域合作的风险较小，并对人类的潜在益处巨大。第五，如果美国大学被阻止与中国合作，它们将不再能与中国科学家分享想法和资源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也不再有能力通过合作、竞争和吸引优秀人才来提升自己。第六，科学合作是一种重要的外交形式，它能产生开放的心态、耐心和同胞之情。一旦开始为更高的目标而合作，来自不同国家的教师和学生往往会克服他们的文化偏见，并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尊重。最后文章总结称，大学在通过教育、研究和共同解决问题来搭建桥梁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大学使用科学和学术这种共同的语言，在对话似乎不可能的时刻，大学有时是唯一仍能架起这些桥梁的机构。美国的大学应该接受并承担架起这些桥梁的责任。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university-united-states-diplomacy>

编译：朱凯泽

8、《外交学人》：中俄在“人心争夺战”中更胜一筹

9月13日，《外交学人》网站发表亚利桑那大学应用科学与技术学院政府学助理教授德米特里·努鲁拉耶夫

(Dmitriy Nurullayev) 评论文章《在全球人心争夺战中，中国和俄罗斯比美国更胜一筹》。文章依据对联合国 30 年来决策投票模式分析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当存在分歧时，其他国家明显更支持中俄的政策立场，而不是支持美国的政策立场。一是支持率方面，数据显示，1991 年至 2020 年间，在 1500 多起中美俄三国意见相左的案例中，支持立场的仅有 14%，大多数国家都与中俄立场一致；二是北京和莫斯科积极参与联合国的议程制定。在 1513 项联合国大会决议中，只有 211 项被美国国务院指定为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的决议。同时，中国在 2000 年至 2020 年期间提出了最多的决议——占总数的 27%，俄罗斯占 15%，美国占 14%——并且这些决议在通过后通常没有异议。三是中俄依赖于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和 77 国集团等软制衡机构。在这些组织的成员国中，与美国达成一致的的比例在 7%到 14%之间，与中俄立场一致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上述现象表明，美国不仅需要与中俄展开基于地缘政治逻辑的大国竞争，还面临决定国际社会“人心向背”的外交策略博弈。目前，借助以国际发展为中心的合作机制，中俄获得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与青睐。对美国而言，中俄之间强大的外交政策联盟以及金砖国家的崛起，都将在不久的将来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带来更大挑战。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9/in-global-battle-for-hearts-and-minds-china-and-russia-have-edge-over-us/>

编译：谭燕楠

9、《政客》：麦卡锡弹劾拜登调查的 7 个关键问题

9 月 13 日，《政客》网站刊登驻华盛顿高级记者雷切尔·巴德（Rachael Bade）的文章《关于麦卡锡对拜登弹劾调查的 7 个关键问题》。作者认为，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9 月 12 日宣布对拜登进行弹劾调查加剧了众议院的内斗闹剧，这场“弹劾赌局”还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第一，共和党人调查的核心是想要证实拜登受贿，但共和党人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拜登个人从中获利，此外共和党人可能还会对拜登提出其他指控，比如他将司法部“武器化”来对付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弹劾调查的时间表尚不清楚，因为如果无法完全说服美国人民，将可能导致弹劾案半途而废。第三，共和党人计划召开听证会以说服民众，力图使美国人相信他们罢免拜登的努力是合理的。第四，麦卡锡将计划展开正式的投票以获取更多调查时间。第五，白宫将会谨慎地应对此次弹劾调查，因为拜登政府如果拒绝合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第六，弹劾调查似乎并不会安抚右翼批评者的情绪，许多共和党议员表示弹劾调查不会满足他们对削减开支或打击边境的强烈意愿。第七，要在众议院弹劾动议上获得终极成功仍是个莫大问号。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3/09/13/playbook-impeachment-questions-00115501>

编译：杨奕萌

10、CFR：美越关系强化评估

9月11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刊登其东南亚高级研究员库兰茨克（Joshua Kurlantzick）、东南亚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助理麦高恩（Abigail McGowan）的文章《评估加强的美越关系》。文章针对目前已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美越关系进行探讨。首先，美越之间这种更高层次的伙伴关系或将促进两国的军事关系，并使两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其次，美越双边关系的发展很可能是出于越南对中国在该地区行动的担忧。然而，越南加强与美国关系并不会导致其放弃“多向外交政策”。越南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两国经济难以割裂；俄乌冲突爆发后，越南也并未回避与俄罗斯的接触。文章总结称，越南新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美越的共同利益水平不断提高，但并不意味着它将离开其他历史合作伙伴。正如东南亚其他国家拒绝在日益激烈的美中竞争中选边站队一样，越南也将继续两面下注。

<https://www.cfr.org/blog/assessing-bolstered-us-vietnam-relationship>

编译：叶如静

11、《外交学人》：中国的“一带一路”如何走向世界

9月12日,《外交学人》网站刊登了杂志主编香农·蒂兹(Shannon Tiezzi)的文章《中国的“一带一路”如何走向世界》。作者回顾“一带一路”倡议1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欧亚过境走廊向全球倡议的转变历程,并指出“一带一路”事实上它传达出来的信号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与中国“脱钩”并不感兴趣。作者认为,在过去十年里,“一带一路”在国家范围和合作领域上都成倍增长,就具体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情况而言,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截至2023年9月,“一带一路”倡议共有154个成员国,占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80%。第二,就经济水平分布而言,高收入水平国家加入少,中高收入国家占比高达79%,只有5个中低收入国家由于外交和内政原因未加入。第三,许多协议都是在大型地区峰会召开前夕签署。第四,“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总体外交政策的总称。第五,加入“一带一路”并不能保证中国投资或发展资金大量涌入,也不排除在“一带一路”之外的国家从中国的对外现金流中受益。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9/how-chinas-belt-and-road-took-over-the-world>

编译:来瑛

编译：朱凯泽、谭燕楠、杨奕萌、叶如静、来瑛、赵金钰、
石佳怡、李一磊、刘嘉雯、和怡然、高隆绪
审核：贺刚、申青青、张丁、郑乐锋